

## 對話歷史，回應當代，連結彼此——《5月35日》到台灣後有什麼火花？

「我們擁有民主、自由、平等，可是，我們可不可以把它當成得來不易的東西，不要濫用它，或太理所當然把它交出去？」



2023年6月1日，台北，舞台劇《5月35日》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端傳媒記者 黃奕潔 發自台北 | 2023-06-08

有一段1989年發生在中國的歷史，在中國不能說，有一齣創作於2019年香港的舞台劇，如今已無法在香港演，《5月35日》便是這個不能說的歷史，與不能演的戲劇的合體。

《5月35日》藉由戲劇，呈現「天安門母親」的視角，故事主軸既不是屠城，也非六四歷史，而是側重她們受到嚴密監控，至今仍無法公開拜祭親人，更無力討回公道的悲傷。

「這個故事講述一對年邁夫婦有血有肉的傷痛，大半生承受揮之不去的鬱結，記憶被禁制、壓抑、消滅、隱藏，」六四舞台主席列明慧簡要解釋這部舞台劇的敘事方向：「直到今天，事件已經被新生代淡忘，可是，苟活半生的老一輩，他們臨終的願望，就是要到廣場來一場光明正大的紀念。」

天安門母親們的願望，至今仍無法實現，於是，香港人年年到維園，以燭光聲援她們。列明慧便是其中一人。



香港前「六四舞台」主席列明慧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**講的是歷史，但反映的是香港**

## 「那些斥責反修例運動參與者為暴徒的人，到底有沒有去確認正發生的事實？有沒有認清過去的歷史？」

曾經走過1989那一年的香港人，幾乎無人不識六四，就算年紀小什麼都不懂，還是會有什麼留在他們身上，像是當年才12歲的列明慧，對於父母緊盯著電視，整夜不關，印象深刻，只覺出了大事；隔日上學，老師們全都穿上黑衣，而校長在台上宣布：中國發生一件令人傷心的事，邊講邊哭，直勸同學們要好好讀書，「要做一個中國人。」

直到中學，她才對這晚發生的事，有了真正的認識，上了大學，才懂得「紀念」。大一，她與同學一起參加維園燭光晚會，甚至留下來協助收拾，最後乾脆加入支聯會義工的行列。2003、2004年大學畢業，她扛起六四燭光晚會司儀的工作，一做就是10年。雖然對於六四事件紀念活動，很是投入，但仍感到燭光晚會有所限制，她們應該可以再多做些什麼？這時她想起中學時參與過舞台劇製作，便在2009年，也就是六四事件20週年時，成立「六四舞台」，嘗試透過戲劇推介八九民運與六四事件。

2019年，即六四事件30週年，他們製作了《5月35日》這部舞台劇。原只在5月底、6月初首演，但五場演出門票，都在公開售票一小時內售罄，於是在7月加開六場。

這是個香港局勢轉變的關鍵年，該年春天，香港人發動反修例運動，7月，行動愈趨劇烈。

「當時，香港發生了七二一事件，就是元朗地鐵內白衣人攻擊示威者的事。」列明慧感嘆：「過去，你知道國內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，但無法想像，它也會在香港發生。」

她在那一刻明白：這就是中國內部維權人士的困境，也終於理解那裡的環境有多差。

「2019年這一年的經歷，讓支持反修例運動的香港人，對六四事件有更深的體會。」列明慧意識到讓這部作品繼續演下去的必要性，因為劇本中很多對白，雖建立在六四語境上，也是回應當下的社會，例如，昔日中共當權者將廣場上的學生和群眾稱為「暴徒」，宣稱他們破壞社會秩序，今時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市民，也被香港政府與警察認定是「暴徒」。

提起「暴徒」二字，列明慧難掩激動，直道：如果天安門廣場上的年輕人真的是暴徒，人們會不遠千里奔赴北京支援學生嗎？而那些斥責反修例運動參與者為暴徒的人，到底有沒有去確認正發生的事實？有沒有認清過去的歷史？「這部劇雖然像是講一段歷史，但也是反映現在的香港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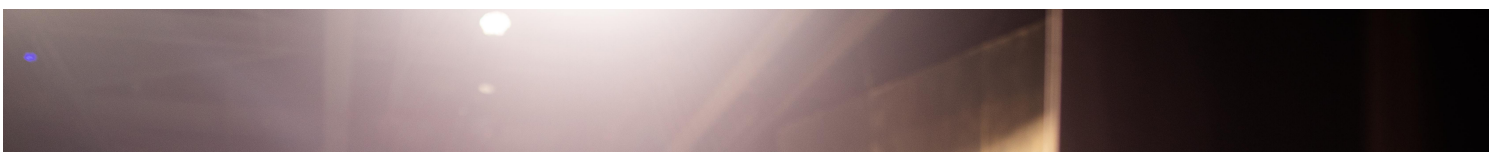
2023年6月1日，台北，舞台劇《5月35日》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隨著2020年COVID-19疫情爆發，香港政府限制人民公開聚集活動，劇團只能偷偷借個場地，錄製《5月35日》（庚子版）演出，在網路公開播放。但即使如此小心翼翼，仍然引得港警上門阻止拍攝。

台灣曉劇場藝術總監鍾伯淵正好在《5月35日》（庚子版）準備期間，率團到香港演出，且有在藝術中心被限制行動的經驗，後來才知道當時港警正在外頭丟擲催淚彈。得以自由活動後，他與香港劇場工作者陳曙曦見面聊天，方對於眼前香港發生的一切有深刻感受。

陳曙曦正是重新演繹《5月35日》（庚子版）的導演。鍾伯淵後來也在網路上看了《5月35日》（庚子版），深受感動，覺得能製作這部舞台劇的機會與經驗，很珍貴。孰料，三年後，因緣際會下，《5月35日》國語版演出工作，交到鍾伯淵手上。

2021年，《國安法》實施，在港府大舉捕人的壓力下，六四舞台解散，列明慧帶著劇本版權離開香港。而這個原操持粵語的舞台劇，因此開枝散葉，有了英語版、日語版，也有了國語版。





曉劇場導演鍾博淵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## 「從個人到集體意志，成為推動巨石的人」

這故事透過一個家庭去反映一個時代，也期待個人意志會成為集體意志，最後成為推動巨石的人。

六四34週年，在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的協助下，《5月35日》國語版首度在台搬演。這個以北京為背景的故事，昔日在傳承六四記憶的香港孕育，來到台灣，便帶了點台灣腔，也埋了些島國面對威權的彼時今日，演化出台灣的DNA。成了一部有著兩岸三地皮骨靈魂的舞台劇。

「我都會舉莎士比亞的《哈姆雷特》為例，這是一個丹麥王子的故事，但創作者是英國的劇作家。所以重點不是誰的故事，而是，這作品有什麼核心價值？我們對這核心價值有怎麼樣的感受？」

1989年，出生台灣北投的鍾伯淵當時不過是個四、五歲的幼童，跟身在香港的小學生列明慧相比，距離事件更遙遠，記憶更是模糊，然而，他說，始終有個印象隱隱置放在腦中：看著新聞的父母，對著電視機發出一聲驚呼。

不論是關注天安門學運發展的父母、對著電視機的反應，或是零星的新聞訊息，六四事件似乎以相似的路

徑，進入那個年代港台孩子的記憶裡。

鍾伯淵說，那些混亂模糊的記憶，都與真空管電視的畫質連結在一起，父母那帶著惋惜或是恐懼的反應，便是他最近身、具體的「六四經驗」。而這種普通家戶面對事件衝擊的心路歷程，便成為他與劇團製作《5月35日》（國語版）的著眼點：一個家庭如何被事件破壞，而他們的生命又建構在何等痛苦之上。

《5月35日》的主角是一對平凡夫妻：妻子小林罹患腦瘤僅剩三個月壽命，丈夫阿大想辦法完成她的心願：去廣場，悼祭愛子。他們的獨子哲哲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前喪命，然而，在國家威權之下，他們既無法求取真相，也不能祭悼，壓抑整整30年後，於風燭殘年時，付諸行動，因為種種原因，最後只能由阿大獨至廣場。



2023年6月1日，台北，舞台劇《5月35日》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對鍾伯淵而言，這是一個走到和解的故事——小林在彌留之際，想像丈夫走到天安門廣場，燒了衣服，表達個人意志，「而這個意志完成的風，及其所帶來的能量，越來越強，強到成為時代的浪潮，得以反抗這30年的壓抑的浪潮。」小林在死亡這刻，完成這件事。

「L有个可耻，但忌忘退笛所带出的力量，是晋个斷滾下去的，對未來，我們也可以有更好的想像。」鍾伯淵認為小林用自己的生命換取丈夫阿大的行動，而阿大的行動，也會帶動更多的行動，「這故事透過一個家庭去反映一個時代，也期待個人意志會成為集體意志，最後成為推動巨石的人。」

站在台灣歷史發展的脈絡下，鍾伯淵的這段詮釋回應了自己的生命經驗與社會認知。他曾經聽過祖母談二二八，描述當時大家都不敢出去，因為外面有人又哭又喊——世居北投的他，日後為了作品做田調，發現當地許多鄉野奇談鬼故事，哀號鬼叫或竹竿夾死人等等，都隱隱涉及刑求或國家暴力，也與北投這個地方軍事設施眾多有關；受教育過程中，他會聽到政治犯柯旗化的故事，也知道神風特攻隊；升上高中時，因為國家徵收土地，強迫他們離開自己的家彷彿連根拔起，而父母不知道如何爭取權益等經驗，都讓他感受到「國家力量」的重大。

2014年太陽花運動之際，公民衝進行政院時，他劇團裡的成員被鎮暴警察打到耳膜都破了。即使當時鍾伯淵人不在現場，但想起這件事，仍語氣激動，憤怒難當。他不斷問：「國家權力是什麼？」

除了對台灣政治社會與國家權力關係的體感，作為劇場工作者，鍾伯淵不乏兩岸四地文化交流的經驗，他說，2012年是曉劇場最後一次前往中國參加藝術節，原因是劇本被審批的經驗，令他不適，無法接受以自我閹割換取演出的處境；約莫2020年1月，他前往澳門演出，因為護照上的台灣貼紙，入境時被帶到小房間訊問，公安以嚴厲口吻質疑他的護照貼，也拿遣返與關押來威嚇他，逼使他將貼紙撕掉。這次入境只停留一天，他便趕著返台投票，再次入境，就受到更嚴格審查。

「我回台灣時，在車上忍不住哭了，我沒有想到會這麼恐怖，他們逼迫你不能這樣想，不能這樣說，這是我在台灣沒有遇過的處境。」鍾伯淵形容，那是一種你必須要把自己腦子切掉，無法做自己的狀態。

他因此理解到，如果有一天，他因為一些原因，放棄自己的話語權，總有一天也會失去自己，若是如此，活在世界上的意義就會消失，「而我們劇場人，某個程度上，就是在追求並實踐如何自己成為一個獨立且自由的個體。」





2023年6月1日，台北，舞台劇《5月35日》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## 從《願榮光歸香港》到《島嶼天光》

「我可以想像到香港人受到的壓迫，中共對人民的鎮壓，從1989年6月到現在，都沒有什麼改變。」

香港的經驗，更讓他警覺。同是2020年1月，曉劇場前往香港，他們在香港藝術中心，感受到外面催淚彈滿布、警察街頭打人的烽火時刻。「我可以想像到香港人受到的壓迫，中共對人民的鎮壓，從1989年6月到現在，都沒有什麼改變。」鍾伯淵說，因為中共政權，我們所不待見的東西慢慢擴散到所謂的「華人圈」，擴散到中國境外，影響我們的思維，「在這過程中，我感到最恐怖的，就是高壓政權向外擴散的狀態。」

如同列明慧所言，2019年在香港發生的事，令香港人對六四事件更能體會，鍾伯淵也是在台灣歷史經驗與兩岸四地往來的過程中，對於「壓迫」有了深刻感觸。因此，他巧妙地透過音樂，將兩岸共有的「審查」與「禁制」在《5月35日》中呈現，例如選擇三首戒嚴時期的禁歌當配樂，像是被認為過於悲傷、有失正常，使阿兵哥懷憂喪志的《望你早歸》，違反善良風俗的《今天不回家》，以及《熱情的沙漠》。

《熱情的沙漠》遭禁，僅因為每句歌詞最後配上的「啊」，讓威權統治政權覺得太挑逗煽情，鍾伯淵表示，對威權或極權政權來說，很多事情是沒有任何依循可言的，只要他們認為不對，就是不對，那麼，一般人民要如何知道自己踰矩了呢？「這其實是矯枉過正，或濫用權責。」

雖同樣是對威權的抵抗，但鍾伯淵在導演《5月35日》時，處理方式不若香港版本的那般控訴，而是壓抑與低迴。

香港演出《5月35日》（庚子版）時，正逢反修例運動，導演陳曙曦在小林斷氣後的設計是，她的靈魂前往廣場與逝去的青年魂魄相會。咆嘯吶喊是背景音，但白幕上投射的卻是戴上頭盔、手中握傘的香港抗爭者剪影。對六四事件的追悼，以及對香港當下情勢的緊迫，在此處接合，《願榮光歸香港》的歌聲也響起。

但鍾伯淵在《5月35日》國語版最後的設計，是讓兩夫婦與愛子，在客廳沙發上重聚，以全家福落定。這個畫面接續的是小林的獨白：「被超度的是我，我被他的愛牽引到廣場，終於不需要幻想，我見到廣場的孤獨，三支蠟燭跟一個老人。30年，生死兩茫茫，在生的人忘記，往生者不知去向，我身處的，是時代的孤寂……。」

伴隨著音樂響起的，是因2014年太陽花運動而生的歌曲《島嶼天光》：

親愛的媽媽 請你毋通煩惱我 原諒我 行袂開跤 我欲去對抗袂當原諒的人 歹勢啦 愛人啊 袂當陪你看電影 原諒我 行袂開跤 我欲去對抗欺負咱的人

「這是一首前去抗爭歌曲，但又有平安歸來的期待。」鍾伯淵說，這首歌與劇本對應的時候，就會讓眾人產生正向的期待。

而這也隱隱呼應小林彌留之際的台詞：「我想像阿大自由的在大街上走，在石板鋪成的廣場上盡情為哲哲痛哭—我多想跟他一起去，去那裡流光我人生最後的眼淚……，」這位老婦人如此獨白：「這裡千秋萬代，無數叱咤風雲的領袖在此接受膜拜，但是，沒有一個為人民帶來真正的幸福和平安，我們的兒子爭取過，沒有成功，但是他們爭取過。」

香港知名劇作家莊梅岩從2017年開始編寫這個天安門母親視角的劇本，一直到定本演出時，恐怕不會料到「我們的兒子爭取過，沒有成功，但是他們爭取過」竟成為香港人的預言。

然而，這段台詞，置入台灣這30年來的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發展，與中港相比，卻是相反而正面的方向。

## 「台灣，處在民主自由的鋼索上」

「我們可不可以把它當成得來不易的東西，而不要濫用它，或太理所當然把它交出去，以至於有一天當我們失去它的時候，要用更大的代價換回來。」

1989年六四事件，難民潮湧向香港，有元的足口与以/日經/月易/的/文化，像是閉門而居六四選總統；對於那年還是小學生的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邱伊翎而言，也有同樣的感受，她看著電視新聞與報章上鎮壓學運的新聞，也是懵懂茫然，只覺得像是重要的事件，但生活中經驗到的卻是不一樣的發展，「覺得世界不一樣了，很像春天到了，土開始鬆動的感覺。」



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邱伊翎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六四事件隔年，1990年，台灣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發動3月（野百合）學運。雖然生長在保守藍營家庭，但邱伊翎年紀最小的姑姑參與了學運，也影響了她，讓她不時嘗試接近現場，好奇觀望，也頻頻與姑姑討論。她笑說，小朋友難免討厭家父長式管教，對於反抗運動感到新鮮且特別，「原來可以在那邊靜坐這麼久，不用上學。」

上了國中，因接觸到比較有本土意識的老師，邱伊翎也逐漸被啟蒙。此時，台灣社會正朝著本土化與民主化方向走，邱伊翎的目光也始終注視著自己的土地，關心的議題都是台灣勞工權益或是性別環境議題，再次接觸到小時候懵懂不解的六四事件，已是2008年她進入台灣人權促進會工作後的事了。

自1989年天安門學運開始，在台灣聲援北京學生的聲音，一直與「血脈相連」、「民主燈塔」間迴盪，論述延續著1949年開始的「反共復國」聲腔，但隨著兩岸關係與台灣政治經濟局勢變化，參與六四紀念活動

的民間團體，從藍營統派，逐漸轉成重視中國人權的群體與社團。邱伊翎印象中，2008年因為北京奧運將至，六四紀念活動便有流亡藏人的參與，議題也多圍繞著中國人權而走，此後還有對維權律師的聲援行動。

加入人權團體後，邱伊翎年年參與六四紀念活動，而每年六四紀念活動主題與倡議，也會依照該年中國的人權議題而定。絕大多數時候，台灣人對六四紀念比較冷漠，幾乎每年六四都是「小貓兩三隻」，也可能遇到颶風下雨，但他們仍然覺得還是要去做。

「香港有是不是要紀念六四的立場辯論，台灣本土派社團也會覺得六四跟我們無關。」邱伊翎解釋，但人權價值無關國界，不論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發生，乃至李明哲的遭遇，讓台灣人漸漸感覺到中國對人權的侵害，也影響到台灣，不能再只是關注境內問題就好，「這些其實不是歷史，而是現在進行式。」

但如同列明慧感覺到維園燭光晚會的限制，於是成立六四舞台，嘗試以舞台劇形式推介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，邱伊翎也認為透過戲劇推廣人權教育與紀念六四，是有創意的方式，畢竟，每年辦六四紀念晚會似乎只停留在同溫層參與，會有侷限性，若要和一般民眾溝通嚴肅的人權議題，也不是太容易，因此，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去年就以放映《5月35日》映製版，作為他們的六四紀念活動。



2022年6月2日，台南，六四舞台劇《5月35日》於成功大地光復校區博物館前的南榕廣場舉行放映，現場約有 120名民眾參與，當中皆有香港人與台灣人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「這就是一對普通老人家的故事。」邱伊翎說，這樣的人會有什麼政治性呢？這樣平凡老百姓的故事，既沒有論述也不用控訴，任何人都可以感同身受，「這是用生活化的方式，讓人理解人權侵害是怎麼回事，如何發生的，又怎麼影響到每一個人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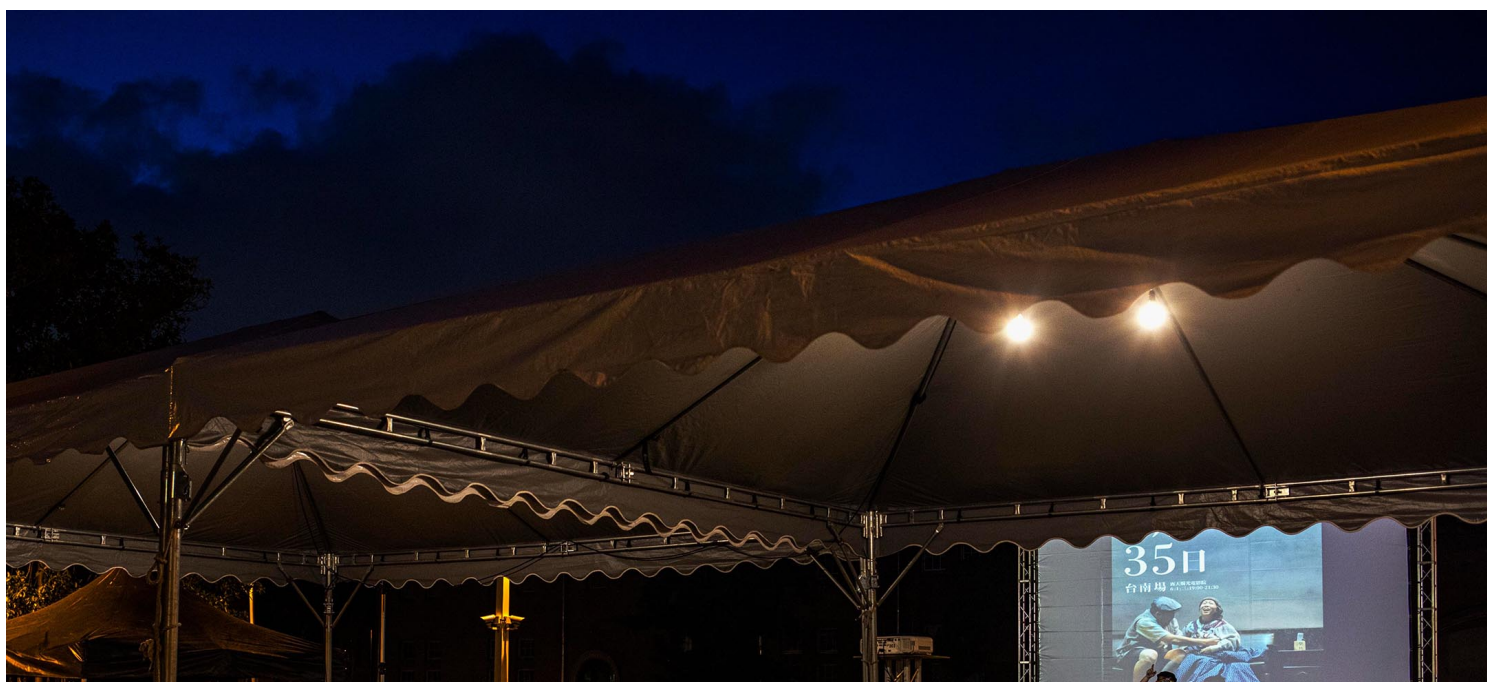
列明慧在任何場合，也是如此提到這部戲對觀眾的召喚：「如果你是父母，你的小孩被不義政權盯上，失去自由，被制度踐踏，你會想讓孩子明辨是非，勇敢求真嗎？如果你是死去的那個小孩，在天上，看著年邁的父母受到政權監控、活在謊言的國度，你會希望白髮斑斑的雙親忘記你嗎？還是會為信念堅持到底呢？」她認為，不論觀眾是何種角色，都能從這部舞台劇找到投射，或與之對話。

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去年放映《5月35日》的錄製版時，吸引不少觀眾，場場爆滿，反應極佳，因此決定今年直接推出《5月35日》國語版舞台劇，讓觀眾有更直接的感動。

作為九零後的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亞太地區倡議專員林立凡，是這個演出計畫的負責人，她知道六四的管道是中學課本，因此，一直有著是「遙不可及歷史」的錯覺，但日後細想，事件發生在她出生前六年，其實並不遠。

作為太陽花世代，林立凡是在自由民主的社會成長，無法真正理解「壓迫」的感覺，但香港反修例運動發生，到《國安法》施行，才讓她有近身感受，發現自由民主的失去，很容易。

「去年，國際特赦組織負責六四紀念晚會的燭光區，我才真正被震撼到。」林立凡表示，因為很多受到局勢影響的香港人移居台灣，而六四活動成為他們的聚合。





2022年6月2日，台南，六四舞台劇《5月35日》於成功大地光復校區博物館前的南榕廣場舉行放映，現場約有 120名民眾參與，當中皆有香港人與台灣人。攝：陳焯輝/端傳媒

源於時代的變化，林立凡認為應該要創造讓民眾比較容易接觸議題的方法，又因為工作需要，她受邀看了《5月35日》後，認為這是個很好的公眾教育管道，開始構思舞台劇演出的可能，最後找到曉劇場執行這項演出計畫。

這場演出活動在4月下旬開放報名，三天內，四場迅速額滿。每個場次約有180席，若含粵語讀劇與貴賓場，約有破千人觀賞此劇。

列明慧對於台灣版本的演出很期待，她重申，戲劇可以在不同地方演出，而在不同地方演出的戲劇，都是回應當代，她很想知道台灣會如何說這個故事，又怎麼去回應台灣的當代？

此外，自香港反修例運動開始，香港民主被破壞，她便感覺到台灣人對香港的同情與支持，因此希望台灣人能夠思考：中國的故事，會不會轉眼間變成香港的故事，而香港的故事，下一步會不會變成台灣的故事？「透過戲劇和藝術，我希望把世界各地同樣爭取公義、反對極權的人連結起來，無論你在何地，難免都會碰上不公義的事，會有需要抵抗極權的時候，當連結起來，就可以互相支援。」

鍾伯淵也有同樣的看法，他說，做《5月35日》時，認知到面對台灣觀眾時，要讓觀眾知道我們擁有民主、自由、平等，可是，我們可不可以把它當成得來不易的東西，而不要濫用它，或太理所當然把它交出去，以至於有一天當我們失去它的時候，要用更大的代價換回來，「台灣，其實處在一個鋼索上。」